

补齐乡村振兴短板：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与推进策略

马建富 陈春霞

摘要 贫困群体的存在是乡村振兴的“短板”。在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我国精准扶贫将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在场”作用、注重贫困群体能力建设、注重教育脱贫关键作用、注重脱贫质量高效高能。由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能够促进贫困群体技术资本、能力资本和心理资本的积累，因而，与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未来，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必须以扶贫理念转变为突破口；构建面向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培育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新型职业农民；坚持以能力扶贫为导向，促进贫困群体自我赋权提能；基于个体特征和需求差异，精准设计培训方案。

关键词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职业教育和培训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1-0014-07

作者简介

马建富(1962-)，男，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常州，213001)，陈春霞(1990-)，女，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教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与模式研究”(17JYA001)，主持人：马建富；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的研究”(2017ZDIXM048)，主持人：马建富；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培训支持体系研究”(18YJC880063)，主持人：吕莉敏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为显性和直接的表现是我国依然有一定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更多。这些贫困群体的存在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短板”，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本文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价值追求的耦合性视角，探讨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有效之策。

一、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精准扶贫的意涵与特征

(一) 精准扶贫的内涵

贫困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复杂的动态概念，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1]这个定义清楚地揭示了贫困的本质特征，指出了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这是人类对贫困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这些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绝对贫困人口快速下降，但是，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这也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一块“短板”。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我们必须对精准扶贫有一个新的更深刻的理解。所谓精准扶贫，就是在扶贫行动中，能够基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根据区域发展背景和差异、贫困群体个体特征及其需求特点，针对真正的贫困群体，提出更具针对性和长效性的

扶贫政策与措施,选择更具适宜性的扶贫路径和策略,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引发贫困的病根,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目标。

精准扶贫是我国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提出的更具效能的扶贫方式,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脱贫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也可为发展中国家扶贫实践提供借鉴作用。精准扶贫理念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精准扶贫特征解读

关于精准扶贫的本质特征,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这里主要从教育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层面对其特征进行探讨。

1.扶贫主体的多元性,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在场”作用

考究一下我国既往的扶贫实践不难发现,我国长期以来的扶贫有一个典型特点,即政府在扶贫过程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扶贫工作,但贫困群体自身却只是被置于扶贫对象地位,作为扶贫客体而对待的。这种贫困治理理念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是扶贫对象脱贫积极性不高,参与性不强,甚至出现许多贫困人口将扶贫工作看成是国家和政府“要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的怪象。这种缺乏贫困群体积极参与的扶贫,难以真正根除贫困现象。

扶贫既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关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经济问题。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应承担顶层设计的重任,并按照科层原则自上而下逐级推行。然而,在后扶贫时代,即2020后消灭了绝对贫困以后,仅仅依靠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还远远不够,贫困群体依然难以真正跳出贫困陷阱,政府扶贫失灵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如果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目标实现来看,我们必须树立新的贫困治理理念。解决政府扶贫治理失灵以及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的关键便是扶贫对象必须以扶贫行动主体的身份参与脱贫过程,即贫困群体必须由原来单纯的扶贫客体跃升而为脱贫主体。这就使得贫困群体具有扶贫过程的“在场性”特点,如此,就可以促使精准扶贫主体模式向理想化方向发展:政府、社会组织和贫困对象三元共治。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过程是精准扶贫理念和模式的重要改变,有利于真正实现精准、有效脱贫的目标。

2.扶贫目标的多维性,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

阿玛蒂亚·森是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认识贫困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饮用水、住房、卫生设施、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必须以多维视角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即在对贫困对象的识别过程中,必须同时把经济收入、教育文化、健康卫生、社会保障等多维指标作为衡量是否贫困的标准,而不只是将经济收入单一指标作为是否贫困的判断标准。根据多维标准判断贫困,是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要真正能够实施精准扶贫,使贫困群体有效脱贫,关键是必须强化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应把贫困群体能力提升作为扶贫的靶向目标,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问题的关键,更是绝对贫困消灭以后,消除相对贫困和预防返贫现象的根本之策。可以认为,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转变为基于多维贫困要素的综合考量是真正的精准识别,而把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作为扶贫的关键措施是真正的精准扶贫,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精准扶贫的优选之策。

3.扶贫措施的联动性,更加注重教育脱贫的关键作用

扶贫需要有关各方协同行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各行动主体联合行动,形成合力,多种扶贫策略集聚瞄准都是必不可少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其中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精准发力更是不可或缺。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人力资本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特性和发展环境的一些人,他们之间的收入有那么大的差距,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贫困阶层?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及由此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不同造成的。这从侧面反映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贫困群体脱贫的重要性。所以,根据舒尔茨的理论,对于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强化其能力建设,将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精准扶贫的重点之策。其中,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有效之策,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能够改变贫困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观念,激发其主动参与扶贫过程的积极性,又能够提升其改变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

4.扶贫管理的动态性,更加注重脱贫质量的高效高能

在以往的扶贫行动中,更多注重的是通过物质支持、易地搬迁等措施扶贫。这些模式的扶贫虽然能够产生即时的扶贫效果,使贫困群体迅速脱离绝对贫困,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病根,扶贫的持久效应比较差,其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返贫率畸高。有学者对124个贫困村调查测算发现,近3年来贫困地区平均返贫率为12.9%。有些地区返贫率更是高达5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接近70%^[2]。正因为如此,返贫治理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

返贫问题严重,表明我国脱贫人口的抗贫能力低,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脱贫措施简单,不够精准,许多措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在未来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必将注重脱贫

质量的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对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升,提升创业发展能力。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价值追求的耦合

从根本上消除贫根,促进贫困群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属性,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首先,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是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包括了贝克尔所认为的知识、技能和体能,涵盖知识、技术、信息、能力等;另一方面,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还包括人力资源的健康、体能、智能、态度与价值观等内容^[3]。职业教育和培训最本源的属性与功能便是赋予劳动者职业技能,使之具有就业或者再就业所需的职业技能,而这既能使贫困群体实现立竿见影的增加收入,消除绝对贫困的近期目标,又能够打破贫困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并终结贫困的代际传递,而这正是精准扶贫根本的价值追求。特别是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终极效果来看,由于其能够使贫困人口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资本的积累,故而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最为稳定的根本性扶贫,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扶贫。此外,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还能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市或者农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其次,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能力资本建设,是精准扶贫的必选之策。在2020年前,我国尚未脱贫的5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将主要是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方式脱贫。这种开发性扶贫具有明显的发展性,而这其中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关键,其他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因为在这些开发性扶贫过程中,只有当农村贫困群体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强了自我职业发展能力,具有创业意愿和基本能力,才能实现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政策的目标要求。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职业能力是反贫困战略的必然选择;而且,只有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群体的能力资本,才是促进贫困群体永久脱贫的根本之策,这正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涵和根本的价值追求所在。

再次,职业教育和培训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心理资本提升,是精准扶贫的至高追求。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部分贫困群体存在的精神贫困影响了贫困群体脱贫的积极性,也导致了“安贫”“争贫”怪象的发生。一些贫困地区之所以难以脱贫、返贫高发,国家的扶贫政策之所以难以奏效,根源就在贫困群体没有强烈的脱贫意愿。精准扶贫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要丰富贫困群体的心理资源,其核心理念是倡导自我成长与自我发展,促使扶贫对象自信、自立和自强,提高其社会参与、社会融入的机遇和能力,从源头上实现脱贫的发展目标^[4]。所以,精准扶贫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心理资源的富足。

精准扶贫的这一目标追求,恰恰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其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等;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重视贫困群体的精神生活,强调激活其积极心理品质,使生活于其中的贫困群体具有满足感、幸福感,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所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对贫困群体进行精神扶贫,可以助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或者提升扶贫效能,由此看出,两者的目标与内容高度吻合。

综上所述,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目标及其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吻合性特征,建立两者高度契合发展的内核体系,以系统耦合理论将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统一架构,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及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不失为我国扶贫过程中的精准之策。

三、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路径与策略

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本源功能与精准扶贫的目标追求高度契合,因此,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实践中,要能有所作为,就必须探索合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之路,有效的发展之策。

(一)以扶贫理念转变为突破口,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效能

理念转变是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成效的重要前提。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实践中,必须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本质及其功能定位有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与精准扶贫思想相吻合的发展理念。

其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扶贫实践中具有多重功能,但人们往往更重视其经济功能,强调通过对贫困群体技术技能的教育培训,促进就业,产生即时的经济收益提高之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一直

以来所追求的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中,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的的“工具性”特征。在这种扶贫理念指导下,人们往往更多地将职业教育和培训目标集聚于短期的消除绝对贫困,而这容易造成返贫现象发生,难以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与此不同的是,以贫困群体为中心,注重贫困群体自我能力建设的扶贫,则具有明显的“发展性”特征。这是职业教育和培训追求的更高的扶贫境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教育扶贫,更倡导其扶贫的“价值理性”职能,强调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以,教育精准扶贫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更涉及思维理念、价值取向等观念层面,是一个“价值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的过程^[5]。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理念的系统性特征,因而,有利于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的整体价值。

其二,从“显性扶贫”到“隐性扶贫”。精准扶贫的重要目标指向不仅是要尽快消灭绝对贫困,而且,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病根,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发生,有效预防或者减缓相对贫困的发生。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显性能力扶贫”到“隐性能力扶贫”的阶梯未打通,容易跌入“贫困黑洞”,造成代际贫困。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对贫困人群进行能力塑造,需要通过全方位和系统化的赋权激发其内驱力,将能力提升内化为其自我认知^[6]。所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扶贫行动中,必须转变长期以来单纯重视贫困群体技术技能等基本能力的养成,而应在培训职业技能的同时,注重贫困人口心理资本的积累,注重贫困群体现代职业精神、创业精神的培育,注重心理潜能的激发,形成贫困群体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其三,从“技术培训”到“赋权提能”。舒尔茨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其人力资本理论第一次使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从外部环境转移到人的主体环境上,凸显了人在扶贫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阿马蒂亚·森则从政治学角度对贫困进行界定,引入能力贫困评价方法。笔者认为,要提升扶贫效能,就必须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要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就是提高人们技术技能的固有思维,形成对受训者“赋权提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理念。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等为主的服务,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水平,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赋予所有贫困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能力,使之具有自主决策与发展的能力。无疑,通过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最终达到治理贫困的目的。

其四,从“阶段培训”到“全程培育”。这主要是指不能

把职业教育和培训目标仅仅停留在阶段性的短期目标,而应该将促进贫困群体脱贫看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教育供给过程,要把对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由“培训”向“培育”转变。也就是要从目前的主要针对贫困群体短期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转变成为贫困群体提供长期的全程教育服务,由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乡村精英;特别是在后续的教育服务中,要基于信息技术等手段,强化跟踪指导服务,及时解决扶贫对象在未来创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指导和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克服创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挫折等,直至其具有了自我发展能力,能够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取得创业的成功。

(二) 构建面向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重点聚焦弱势群体

贫困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之一,而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正是由于其人力资本的缺失。《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显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参加非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仅为10.6%,最高的新疆也仅为22.2%,而西藏、海南、黑龙江、吉林分别只有0.1%、3.0%、3.2%、3.6%。所以,构建面向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是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之策。这一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县域整体架构。总体上说,我国贫困现象逐渐显现出集中与分散共存的特点,或者说散布、集中于县域范围内。因此,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构建面向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树立县域整体的理念,统筹考虑相关教育培训资源的布局及统筹使用问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加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建设,必须强化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在扶贫中的主体作用,形成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或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要加强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和资源的整合工作,统筹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调研,形成与精准扶贫相对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为所有贫困群体提供充分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其人力资源开发。

其次,靶向相对贫困。面向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但是,考虑到我国贫困的现状以及精准扶贫的目标指向,基于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未来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的构建,必须更多地考虑满足消除相对贫困的需求。自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以来,脱贫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6年的4.5%^[7]。因此,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虽然是艰巨的任

务,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与此同时,尽管按现行标准衡量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在快速下降,但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14年,农村20%高收入组、20%中等偏上组、20%中等组、20%中等偏下组、20%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分别为23947.4元、13449.2元、9503.9元、6604.4元、2768.1元,高收入组分别是其他收入组的1.78倍、2.52倍、3.63倍、8.65倍^[8]。由于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动态性、不平等性和主观性等特点,因而,要改变越来越多的相对贫困现象,则不是低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所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建设更为发达的、多层次的、有利于贫困群体能力提升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其中,纵向贯通、校企协同共育是该体系的显著特征。

再次,关注弱势群体。以妇女、残疾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是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弱势群体之弱,关键在于他们由于性别角色以及生理缺陷等缘故,致使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发展机会严重受限,由此导致其成为贫困群体。残疾人是贫困群体中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返贫率最高的群体。我国8500万残疾人中70%左右生活在农村,其中尚有1230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未能实现脱贫,占同期农村贫困群体的17%,其返贫发生率高达10%,超过同期全国农村7.2%的贫困发生率^[9]。农村贫困女性化现象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我国贫困群体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农村7017万贫困群体中妇女占45.8%,且具有典型的多维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教育、健康、权利的剥夺^[10]。

因此,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精准扶贫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特点,积极开展基于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需要及其特点的调查研究,主动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侧的改革,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优先、优质、便捷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权利和机会,促进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为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扫清障碍。

(三) 精准定位和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功能,重点培育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新型职业农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基于消除相对贫困的需要,积极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功能定位与发展重心,以有效促进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

1. 积极拓展服务功能,高度关注转移人口“贫民化”现象

未来我国农村社会贫困现象将会呈现出新样态、新特征,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积极应对,主动进行供给侧服务功能定位的转变。一是应将职业教育和培训由原来的主要为贫困群体提高职业技能,帮助消除绝对贫困,向进行多层

次的继续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群体动态适应能力,以及应对相对贫困转变。二是未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要注意能够促进贫困群体经济收入增加,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更要注重贫困群体自我能力的提升,为贫困人口脱贫以后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积累丰厚的“三维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应从主要瞄准农村贫困群体,向同时关注和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后的城乡贫困群体脱贫转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部分贫困人口发生了空间转移,另有部分转移后的人口沦为新的城市贫民。这种新的贫困现象的出现,给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为此,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基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的必然趋势,积极关注、瞄准城市贫困群体,使职业教育和培训在预防和解决城市贫民问题中能够主动作为。

2. 培育乡村精英,引领贫困群体跳出“贫困陷阱”

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职责,也是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和现代农业“后继乏人”的关键;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乡村精英尤其值得高度关注。乡村精英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是农村社会的骨干力量,在乡村振兴尤其是助推贫困群体跳出“贫困陷阱”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有研究者通过对S省三个贫困村的组织化贫困治理实践的调查表明,建立农村精英带动、一般农户支持、贫困农户参与的农民合作组织,是贫困人口成为反贫困治理主体力量的有效途径^[1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精英感知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机遇,他们能够率先开始并运用自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带领贫困群体创业发展,扮演着先行者和带领者的角色。职业教育和培训理应主动瞄准农村社会这些少数的精英阶层,通过相对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素养,尤其是培养其领导素养、公益服务意识和精神,由此引领所在地区的贫困人口创业发展,跳出“贫困陷阱”。乡村精英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在于启发贫困群体的脱贫自觉性,并积极组织贫困群体创业,发展新业态。在乡村精英培育中,地方高职院校尤其是涉农高职院校以及县级职教中心,可以结合区域产业特点、特色,贫困群体状态以及乡村精英组成特点和需要,开展相关的专业或进行长短结合的多层次培训。

(四) 坚持以能力扶贫为导向,促进贫困群体自我赋权提能

1. 能力导向,注重贫困群体“三维”资本积累

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给予贫困群体一定的职业技能,可以促进其就业,提高收入,摆脱绝对贫困。然而,要使贫困

群体真正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频发,职业教育和培训就必须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加强对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有学者认为,贫困是个体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上低水平互动的结果^[12]。心理准备不强更是导致贫困群体自我能力建设动力不足的关键。所以,职业教育和培训在面对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必须深刻理解“三维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贫困群体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并在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设计以及教育培训模式构建时,注重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提升贫困群体的可持续脱贫能力,提升脱贫的质量。

2. 启迪民智,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发展动力

在我国长期的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很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扶贫过程中贫困群体的声音微乎其微,其公共形象往往被约定俗成地作为被救助者、受益者和表达感激者,贫困群体的生活世界、认识世界里的信息往往被忽略或者被过滤掉,贫困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主体性受到忽视^[13]。人们虽然认识到了贫困群体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贫困群体依然是被动“在场”,其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张扬。第二个问题就是重视物质扶贫,忽视精神扶贫。物质扶贫是扶贫起始阶段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国扶贫过程中曾经也确实起到过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露。在一些贫困人口看来,扶贫是国家的事,政府面对贫困群体不会“见死不救”,如此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产生了等、靠、要的心理,这有悖国家扶贫政策的初衷。由于扶贫靶向的严重偏移,扶贫政策的效力自然大大下降,特别是还助长了部分受助贫困群体,长期不愿放弃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红利的风气,甚至为了继续享用这些无本有利的政策,往往还瞒报收入、不愿脱贫,以贫为荣。另外,从扶贫对象角度看,只有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真正“在场”,主动参与扶贫过程,才能有效解决贫困治理问题,所以,贫困群体作为主体参与,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义和关键。正因为如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14]。

在我国的扶贫行动中,应该坚持和尊重贫困群体在脱

贫攻坚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迈向一条以贫困群体为中心的内生性发展道路。也就是说要在扶贫行动中,强化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启迪民智,让贫困群体真正认识到精准扶贫战略是一次拓展他们生存能力和增强发展能力的重要机会^[15]。当然,由于贫困群体的差异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过程中,必须基于贫困群体的不同特点进行差别化激励,让所有贫困人口都能走向扶贫的前台,成为脱贫的主体和主角,最终真正实现由输入性扶贫向内源性扶贫转变。

(五) 基于个体特征和需求差异,精准设计和提供更具适宜性的培训方案

研究表明,贫困群体正是由于教育贫困造成了其缺乏跳出贫困陷阱的能力。所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必须充分考虑目标扶贫群体的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精准识别贫困群体个体特征,研制个性化培训方案。也就是在组织贫困群体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时,不再将所有受助群体都视为同质化的培训对象,而是结合农户各自的差异化条件,对农户需求进行精确定位,增强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分别提供更具针对性、适用性的技术培训服务^[16]。如“90后”和部分“80后”中存在的贫困群体,可以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创业教育培训,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另外,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教育基础的贫困群体对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差异,开展相应的培训。有关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贫困户对培训的意愿和要求不同。60岁以上贫困户的需求类型首选是生活保障,比例高达67.2%,而获得劳动技能培训的需求仅为17.8%;50~60岁贫困户的生活保障需求较60岁以上的明显降低,对劳动技能培训的需求为26.4%;50岁以下的贫困户对劳动技能培训、发展特色产业和贴息贷款用于生产的意愿分别为37.3%、35.1%和20.5%,均高于50岁以上两类贫困户对这三者的需求^[17]。这些个体需求的差异性正是制定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的根本依据,只有建立在贫困群体有效需求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才会受到欢迎,并产生积极的培训和扶贫成效。

参考文献

- [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贻,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5.
- [2][6]王磊,张冲.能力扶贫:精准扶贫的发展型视角[J].理论月刊,2017(4):157-161.
- [3]陈波涌,唐智彬.论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内容与途径[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90.

- [4]程肇基.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J].江西社会科学,2016(11):210-216.
- [5]代蕊华,于璇.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治理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7):9-15.
- [7]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 [8][10][13]刘少杰.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1.34.135
- [9]崔丽.1230万农村残疾人尚未脱贫[N].农民日报,2015-10-17.
- [11]孙迎联,吕永刚.精准扶贫: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研究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17(1):60-63.
- [12]田飞.贫困指标体系问题研究[J].学术界,2010(11):211-219.
- [1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2018-01-02.
- [15][17]马建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功能定位及支持策略[J].职教论坛,2018(10):18-24.
- [16]何安华,等.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3):116-123.

Completing Short Boar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Pursuit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a Jianfu, Chen Chunxi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poor groups is the “short boar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sence” role of the poor groups, the ability building of the poor groups, the key role of education in poverty overcoming, and the highe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overty overcom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 capacity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groups, so it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futur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ust take the concep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construct a support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oor groups; cultivate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with rural elites as the core; adhere to the ability-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e self-empowerment and capacity-raising of poor groups; precisely design the training programs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 differenc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uthor Ma Jianfu, professo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en Chunxia, teache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